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外国名著



思特格奇

“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到，自己从青年时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并连续列举了一系列法国思想文化的巨擘，其中就包括雨果。在2016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一文中提到，法国文学中最让他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悲惨世界》很高的评价，指出“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

对于法国人民而言，雨果不仅是一名卓越的文学家，更是承载民族精神的圣哲。雨果80多年的人生中，经历了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封建力量又暴露出身顽疾的特殊历史阶段，其生活与创作也都紧密地嵌在这一大的历史过程中。雨果见证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到第三共和国的历史风云变迁，亲历了第二共和国的稍纵即逝、两个波旁王朝的苟延残喘与两个拿破仑帝国的骤兴骤灭。时代的烙印化入雨果的笔端，与他的文学天才相感应，成就了《巴黎圣母院》《笑面人》《九三年》等佳作。《悲惨世界》又是雨果作品中的翘楚。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冉阿让是串联起整部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因小罪受重刑，但他幸遇善缘，从此改过自新，却又由于无心之失而再次被缉捕。隐姓埋名逃亡期间，他拯救了饱受凌虐的孤女珂赛特并加以抚养。冉阿让在与养女的相处中获得了天伦之乐，但还是为了她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开始离群索居，仅在生命最后一刻迎来心爱的人回归才安然逝去。冉阿让的

身上寄予了作者对人性的崇高期望：他强健睿智、正直诚朴，富于怜悯之情和正义之心，宁愿自首也不愿无辜之人代己受过，又能慈悲大度宽恕屡屡逼迫自己的敌人。他戏剧性的经历和高尚的人格，给读者留下久久回荡的触动。

《悲惨世界》中具有震撼力和爆发性的内容还有很多。小说主人公冉阿让服刑19年后对社会充满怨愤，社会对他也百般拒斥。此时，卞福汝主教却对他开门接纳，宽恕了他愿将仇报的盗窃并给予他庇护，最后用谆谆叮咛唤醒冉阿让的良心，实现了对他灵魂的救赎。此外，书中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风貌，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亮相，有滑铁卢战役、1832年共和派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穿插，使得小说内容极为丰富，意旨极为宏阔。小说的影响也是震撼性的，该书问世后迅速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风靡欧陆，远传美洲，尤其赢得了劳工阶层的广泛喜爱。此后，《悲惨世界》的影响长盛不衰，有了各种译本甚至衍生作品，还被无数次搬上银幕、舞台。

对当今的中国读者而言，品味《悲惨世界》承载之“道”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取得高速发展和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相应加强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是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读《悲惨世界》的过程中，则能很大程度上更充分地理解精神与道德的力量。除卞福汝、冉阿让以外，道德的力量在书中还有很多体现。

例如，革命者安灼拉虽秀美如少女，但他庄严的气质和对革命的热忱则让他成为革命青年公认的领袖，其人格魅力甚至能在浮浪子弟身上激发出视死如归的气概。冉阿让后半生一直为保护养女珂赛特而自我牺牲，是他“化作春泥更护花”才成全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安灼拉则生活得像“斯巴达人和清教徒”，把祖国作为唯一的“情人”。《悲惨世界》所塑造的榜样，依然可以为当下的中国奋斗者提供精神鼓舞。

《悲惨世界》所传递的精神也与社会历史之“道”相关。雨果与马克思、恩格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都受法国大革命和其精神余韵深深影响，都曾在巴黎居住，都批判过路易·波拿巴的倒行逆施，也同时对巴黎公社起义或赞或惊。相比革命导师，雨果对社会历史的理解略显情绪化而失于精准，其观点也曾受到马克思的批评，但雨果小说中留下的时代侧影，却有助于我们更生动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源。雨果将“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视为19世纪的三个问题，小说中所描绘的伽弗洛什、芳汀等孤儿弱女的悲惨遭遇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实际上，正是无数相似的人间悲剧令关注人类幸福的革命导师开始思考，最终寻找到问题的根源与解决的路径。

最后，《悲惨世界》的墨香文韵也播撒在中法友谊发展的道路上。早在1903年，《悲惨世界》就被苏曼殊译为中文，之后陈独秀、鲁迅、林纾等许多名家也都有对该书



《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再版）

的续译、选译。《悲惨世界》揭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所以能够与中国志士仁人匡时救世的探索与奋斗交织到一起。而《悲惨世界》宣扬对世界的博爱、对道义的坚守，也是秉着这些理念，雨果生前一直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并出于公义指责蹂躏圆明园的英法联军是“强盗”，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意。此外，《悲惨世界》不时流露出的民族自豪感，展现出一一种法兰西民族的独特气质。而这也是法国独立自主外交的精神来源，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戴高乐总统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为中法建交作了极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再谈《悲惨世界》也是对老友的回访，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法两国、中欧两大文明交往与合作的文化基础。

用伟大建党精神激发勇攀高峰、开拓奋进的志气和士气，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要敢想敢干，各项工作都高位定标、量化指标，事争一流、唯旗是夺，“保五争三奔第一”，确保山东整体工作走在前。要真抓实干，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力弘扬“严真细实快”工作作风，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要善作善成，对部署的任务、作出的决策，有一股钻劲、韧劲，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做就做好、做则必成。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伟大建党精神穿越“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踏上“新的赶考之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久弥坚、光芒四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着力提升党性修养、激发干事热情，满怀信心、大步向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箴”这一文体的产生及其功用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指出：“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意思是说，箴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并很快成为非常盛行的一种文体；箴和铭这两种文体虽然使用的场所和各自的名称不同，但是用作警示告诫的作用却是一致的。

早期的箴文均是官箴，东汉后期始有官箴与私箴的分野。官箴的作者最初只是担负不同职责的官员，而最高统治者乃是官箴规诫的基本对象，但是其后不久，最高统治者也开始成为官箴作者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于是就有了出自最高统治者之手、以各级各类官员为训诫目标的这样一类官箴作品。

先秦时期的官箴

流传至今的三代官箴，以周武王时的《虞人之箴》最为完备，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它是周武王时掌管山泽苑囿的虞人，为响应太史辛甲的号召而作，意在劝诫最高统治者铭记前人的教训，节制兴师动众的田猎，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消除国家面临的各种忧患，创造人与百兽“各有攸处”、各得其乐的良好环境。显而易见，这是一篇典型的“官箴王闕”之作。

时隔不久，贵为天子的周成王也加入了官箴作者的队伍。他作了一篇《大正箴》，主旨在于告诫主管刑狱的大正官务必做到“临狱无颇”“正刑有援”，即心怀戒惧公正判案，而“明德慎罚”则是贯穿《大正箴》的一条红线。

此后，春秋早期的卫武公和春秋中期的楚庄王这两位诸侯国国君分别作了《耄箴》和《勤箴》，前者恳切要求百官“恭恪于朝”，发现问题及时告诫，听到忠言如实反映；后者谆谆告诫群臣必须谨记“民生在勤”的古训，戒懒戒惰。

汉唐时期的官箴

公元6世纪初，梁武帝萧衍《凡百箴》以群臣百官为告诫对象，要求他们一要做到“事无大小，先当孰思”，即凡事都须深思熟虑、周详谋划，否则，“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势必贻误事情、劳民伤财；二要做到“其心不定，不可施令”，即心志不定、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切忌实施政令，否则，不仅可能导致“乱常”“败政”，还可能造成“辱身”“丧命”的惨痛后果；三要做到“勿恃尔尊”“勿谓尔贵”，即克服傲慢态度和跋扈作风，否则，倨傲不恭、盛气凌人，终将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篇官箴围绕决策、施政和处世等所作的阐述，既言简意赅，又入情入理，值得玩味和借鉴。

大唐时期，太宗李世民、武则天、玄宗李隆基和德宗李适先后有官箴作品行世。李世民所作《帝范》原本是告诫太子而作，篇中细述治乱兴亡之迹、临民理政之道，在中国古代官箴书创作史上具有发轫之功。武则天在正式摄政前所撰的《臣轨》属于训诫臣僚之书，该书围绕文武百官砥砺官德、提升本领而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在当时的朝野上下产生了巨大影响，东传日本之后同样备受推重，被认为颇有益于治道。玄宗皇帝的《令长新戒》以县官为规诫对象，要求他们勤勉政事、体恤贫苦。由于这篇官箴短小精悍，各地县官纷纷刻石自警，由此带动了官风的新变，涌现出的清官廉吏不胜枚举。德宗皇帝作有《刑政箴》和《君臣箴》，前者是“监于往躅，书以自勸”的自警之作，后者则重在箴戒近臣，要求他们“咸思正直”，积极进谏。

有唐一代四位最高统治者相继颁布官箴，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5篇官箴，就规诫对象而言也各有侧重——《帝范》针对的是储君，《臣轨》针对的是满朝文武，《令长新戒》旨在劝勉县官，《刑政箴》《君臣箴》则分别把自身和近臣作为目标。

两宋明清时期的官箴

在唐代太宗皇帝等的影响带动下，后世最高统治者颁布官箴渐成风气。五代十国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写了一篇96字《官箴》“颁于郡国”，其中“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和“尔俸尔禄，民膏民脂”4句16字堪称全篇之警策。时至北宋，宋太宗干脆把孟昶《官箴》中的上述4句颠倒顺

中国历史上的官箴

周东娜

序，从而组合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16字官箴，御笔亲书后颁行天下，要求地方官吏“遵以为戒”。宋太宗驾崩之后，继位的真宗皇帝先后颁布了5篇官箴用以“自儆”。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也写有一篇题为《赐宣州金判仙柏龄箴》的官箴。

明代的官箴，最值得一提的是宣宗皇帝创作并颁行天下的35篇官箴。这35篇官箴“取古人箴箴之义，凡中外诸司，各著一篇，使揭诸厅事，朝夕览观”，影响持久且巨大。后来，它们被合为《御制官箴》1卷刊印成书。

清代的顺治、康熙、乾隆、嘉庆这4位皇帝也各有自己的官箴作品。顺治皇帝所著《人臣傲心录》是一部典型的“官箴王闕”之作，它在梳理古往今来“奸臣恶迹”的基础上，概括出思想、行为共8个主要方面的风险点，进而有针对性地各书一篇，对群臣晓以利害，以儆效尤。康熙皇帝的传世作品甚多，其中就包括《讲官箴》《祭酒箴》《给事中箴》《御史箴》《台省箴》《太常箴》《提镇箴》《督抚箴》《守令箴》《河臣箴》《漕臣箴》等官箴。乾隆皇帝所作官箴计有4篇，即《敬天箴》《法祖箴》《勤政箴》《亲贤箴》，合称《养心殿四箴》。嘉庆皇帝也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官箴作者，据《清史稿·仁宗本纪》记载，他曾“制官箴二十六章，宣示臣工”。

如果说上述4位清代皇帝的官箴作品重在规诫文武高官，那么雍正皇帝则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了州县官们的身上。雍正皇帝在继位后的第二年，就责成洞悉地方利弊、具有丰富治理经验的朱轼、沈近思二人，编撰为州县长官提供任职指南的官箴书，只是由于所托二人一死一病，才造成了这部书的一再迟延。随后，雍正皇帝敕令朝重臣田文镜、李卫，在已有的基础上补写完善。田、李二人全身心投入其中，书稿不久即告完成，这便是《州县事宜》，又名《钦颁州县事宜》或《训饬州县条规》。雍正皇帝将《州县事宜》“颁赐州县官各一帙，俾置之几案间，朝夕观览，省察提撕”，从而为他们尽快进入角色、担当作为，指出了迷津，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自西周初年的成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皇帝，历朝历代从事官箴创作并有作品传世的最髙统治者共有十几位。在他们名下，官箴文有90多篇，官箴书则有4部。这些官箴无疑都是传统官箴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时移世易，尽管古代官箴文献中的某些说教已经过时，但是贯穿其中的砥砺官德修养、提高为政本领等基本原则和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